



毛泽东

蒋介石与斯大林

袁南生◎著

下

他们几度为盟友，又几度为对手
三位历史巨人之间的握手与较量，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中国

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

(下)

袁南生 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 下册 / 袁南生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38-6687-4

I. ①毛… II. ①袁…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②蒋介石（1887~1975）—生平事迹③斯大林, J.V.（1879~1953）—生平事迹 IV. ①A752②K827=7③A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8319号

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下）

著 者 袁南生

出 版 人 谢清风

策 划 人 周 政

策划编辑 李蔚然

责任编辑 李蔚然

特约编辑 聂双武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年08月第1版

2014年0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50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6687-4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目录

第十三章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另眼相看

351

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泽东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这说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抵制到支持的过程同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影响逐步扩大、在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最后取得最高领袖地位的过程是一致的。

林育英对毛泽东的支持，再一次体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当时无论是张国焘的资历、地位，还是张国焘当时的“实力”，应该说是可以与毛泽东“抗衡”一下子的，如果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排斥、打击毛泽东，其密使就不可能在关键的时候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第十四章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幕后的角逐

387

蒋介石和斯大林这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这一点使得两人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发生纠纷时，也没有忘记为改善双方关系进行试探。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面前，蒋介石鉴于对国联和西方大国干预的失望，不得不在对苏关系调整上，采取主动。三思之余，蒋介石心血来潮，忽然想跨过

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同斯大林谈判建立中苏抗日军事同盟的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欢欣鼓舞，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安事变表示愤怒，他们毫不犹豫地谴责了张、杨。就在苏联谴责西安事变的这一天，毛泽东对如何处理蒋介石的考虑和态度发生了变化。他由主张“罢免”、“审判”蒋介石，转为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就是说，仅仅过了两天，毛泽东就改变了如何处理蒋介石的态度。显然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对毛泽东处理西安事变的影响。

第十五章 斯大林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421

毛泽东当然清楚，王明的话并非仅仅他个人的意见，在王明的背后，站着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等不可小觑的人物。他知道，按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意见办，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促进国共两党的日益接近和合作，促进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即为了与蒋介石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不惜牺牲共产党的利益。这不仅会给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共产党以可乘之机，而且会促成中国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滋生和发展。

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的班子典型地说明了莫斯科已首肯毛泽东正式担任党的最高领袖，而无意于让王明掌舵。因为，如果莫斯科打算让王明担任党的最高领袖，王明决不会同意他的名字排在毛泽东之后。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更加坚定了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主张。

第十六章 毛泽东与莫斯科在皖南事变问题上的矛盾

471

正是因为摸到了斯大林不赞成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翻脸这个底牌，蒋介石才敢于贸然发动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发生，不仅引起了中共中央对蒋

介石国民党的极大愤慨，而且引起了毛泽东等人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忍无可忍，决定立即结束政治上的温和态度，“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在“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莫斯科再次干预了毛泽东的做法。对这一严重的反共事件，莫斯科姑息迁就，主张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反对毛泽东采取同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政策。

第十七章 盛世才：斯大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拉拢的对象

504

以斯大林“钦差大臣”自居的王明以及康生回延安途经新疆，受到盛世才空前热烈的欢迎。盛世才向王明、康生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盛世才的要求肯定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经新疆赴莫斯科，受到了盛世才的热情接待。在会谈中，任弼时告诉盛世才：中央政治局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此事非请示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不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却出人意料地批准盛世才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也许，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盛世才，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第十八章 斯大林和毛泽东上下级关系的终结

528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一方面认定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另一方面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同莫斯科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按照莫斯科的指挥棒转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要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摆脱莫斯科的消极影响和支配。

于是，毛泽东开始发动整风运动，以便在全党范围内扫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

进一步破除人们对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指挥中心”的迷信，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整风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的干预，彻底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十九章 共产国际解放后的三强角逐（上）

565

毛泽东虽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谈判，但他内心对斯大林始终有看法。特别是电报中关于“如果发生内战的话，中华民族将有毁灭的危险”这句话，整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10多年。在毛泽东雄心勃勃要与蒋介石逐鹿中原、一决雌雄，并希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与援助时，斯大林心目中能统一中国的最佳人选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

当毛泽东在憧憬趁抗日战争胜利的东风，争取斯大林的援助，以与蒋介石一决雌雄的灿烂前景时，斯大林与蒋介石却已达成外蒙古独立，支持国民党，牺牲共产党利益的幕后交易。这是不是历史开的一个苦涩的玩笑？

第二十章 共产国际解散后的三强角逐（下）

636

由于斯大林改变了对华政策，支持中共夺取政权，这就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联的首先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与声援，打破了美国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孤立图谋。新中国诞生后，中苏关系出现了崭新局面，也使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在原来单纯的世界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领袖之间的关系，发展成了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斗争中，斯大林对新中国的支持，对毛泽东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内心里，对斯大林是十分感激的。

毛泽东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不得不将解放台湾的计划搁置深感不快。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在这个问题上埋怨斯大林。他肯定地说：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毛泽东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未能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他为此而终生感到遗憾。

第二十一章：结语：并非多余的话	706
------------------------	-----

主要参考书目	738
---------------	-----

修订版后记	746
--------------	-----

第十三章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另眼相看

是压毛泽东，还是抬毛泽东？

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和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电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一手操纵的这次会议上，米夫提名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并没有为毛泽东带来实际上的利益，相反，在遭到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之后，毛泽东又受到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更加严厉的排斥、打击。可以说，在随之而来的几年中，毛泽东受尽了“窝囊气”。

毛泽东之所以受“窝囊气”，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王明的崛起。

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一步登天，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时，向忠发仍是总书记，但只是一个名义，实权逐步转移到了王明的手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人，生于1904年，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取俄文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1926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向导》编辑。大革命失败后，又去苏联。1929年回到上

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0年底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王明上台后，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政策，派遣要员渗透苏区，“钦差大臣”满天飞，高扬“转变路线”的大旗，四处扫荡异己，对持不同意见者，不择手段进行排斥和打击。

王明最初是想拉一把毛泽东。但他很快发觉毛泽东非等闲之辈，毛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并有自己的战略和策略，绝不是拉一把就能拉过来的人。

况且，毛泽东的资历比王明老，威信比王明高，这成为王明“左”倾错误在苏区党和军队内贯彻执行的巨大障碍。王明深知这一点。王明要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不能不排挤毛泽东，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为了对付毛泽东，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三个步骤。

第一是取消毛泽东对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权。

1931年4月，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又称“三人团”）由上海抵达苏区，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开展反右倾斗争。

1931年11月，“三人团”主持召开了赣南会议。会议在“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纲领指导下，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是“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是“富农路线”。因为当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而毛泽东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主张给地主、富农以出路。

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

会议全盘否定毛泽东在苏区的成就，撤销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排挤他对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第二是削弱毛泽东的军权。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第一号电报指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主席、副主席完全按中央一号电报开列的名单任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军队集中统一于“中革军委”指挥。这样，就取消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遭到削弱。

第三是将毛泽东排挤出军队。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又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为代表的正确政治军事战略，同王明“左”倾错误长期斗争的总爆发。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左”倾指示，否定了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党的群众力量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他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是“等待主义”，要求给予“及时和无情的打击”。

会上对毛泽东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错误的批判。

现存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这样表述：

“会议中批评了毛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会议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因此，尽管周恩来力争，会议还是撤销了毛泽东刚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调他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取消了他对红军的领导。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王明代理党的总书记。但是，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代理总书记工作艰苦，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王明盘算再三，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同年11月，王明辞去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交给年仅24岁的博古，让他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自己偕妻子孟庆树离开上海到了莫斯科。

临别时，王明再三嘱咐博古：“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王明到苏联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共

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这时的王明，本身已经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他坐镇莫斯科，通过无线电遥控上海以博古为新“舵手”的中共中央，再由博古向瑞金发出种种指示。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共产国际通过其指导下的王明等人实现对中共中央的遥控。

1933年初，临时中央由于白区工作遭到破坏，无法立足，被迫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博古、张闻天等沿着秘密通道，由上海来到瑞金，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他们既把毛泽东架空，又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终于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那么，这段时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怎样呢？

1930年5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或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照搬俄国革命的一切可能走不通，毛泽东和朱德依靠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办法也许能够为中共夺取政权创造条件。

斯大林曾向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¹

斯大林这样说，实际上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肯定毛泽东的路走对了。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毛泽东式的革命道路，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共迅速将其主要干部和整个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

1930年秋天，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毛泽东得以顺理成章地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宗派主义集团把持了中央。这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在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按照惯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应该担任未来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向忠发考虑他不在苏区，而在上海秘密状态下工作，并且很少可能前往瑞金，因此，他主动提议，由创立这一根据地，并身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来任政府主席。

谁担任政府主席，这是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把总书记的这一提议先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继而又转报到莫斯科，很快得到了莫斯科的认

¹ 参见青石：《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

可。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连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都不是的毛泽东，一跃而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在注重形式和名分的莫斯科看来，毛泽东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的了。

毛泽东虽然担任了政府主席，但仍旧兼任红军总政委，坚持随军行动，并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指挥军队作战方面。然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受莫斯科原则指示的影响，习惯于按政治教条看待军事作战的方针，很快与毛泽东避敌锋芒的游击防御战术思想发生了意见分歧。

1932年秋天，在国民党大举“围剿”期间，毛泽东坚决反对采取“进攻路线”，由此发生了毛泽东与中央局多数人的激烈争论。中央局多数人一致提议取消毛泽东的军权，由周恩来接任总政委一职。

想不到，这一情况报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再报到莫斯科以后，无论是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都一致反对。

可以推测，王明是会站在博古一边的。当共产国际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时候，王明转而请求苏共中央给予指示。本来，苏联共产党也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但是，事实上，共产国际是苏联共产党为主创立的，领导权掌握在苏共中央手里，连经费也是苏联给的，因而，苏共中央反而成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

王明将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争论上报苏共中央后，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专门研究了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尽管他们也认为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不对的，但他们明确认为不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莫斯科随后发给上海转往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明确指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

可惜，莫斯科的裁决来得太迟了，事情已经难以挽回。

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逐渐成了“光杆司令”。没想到，共产国际于1933年3月致电中共中央，特别提醒博古等人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不要走得太远，强调“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和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²。

博古等人在共产国际的这一态度的影响下，也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改变对

2 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3页。

毛泽东的“冷淡态度”。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李德回忆说：

“直到1932年底和1933年初，我们在上海委员会见面时，还多次谈到过这个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阿瑟·尤尔特同志以及博古、洛甫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都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冷淡态度’，在给瑞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指示中，他们都强调‘一定要使毛泽东的情绪改变过来’，并且强调指出，一定要使他通力合作。”³

1933年底，由于在苏区建设尤其是查田运动中临时中央与毛泽东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冲突，毛泽东再度称病告假。博古等人竟然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就是让毛泽东离开中央苏区到莫斯科去，美其名曰到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去养病。

博古等人关心毛泽东的身体健康不能说完全是假，但借此达到将毛泽东一脚踢开，完全消除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的确是真。

博古等人没有料到，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据吴黎平回忆：“中央曾开会讨论苏区财政问题，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⁴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在中央苏区召开。按照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最初的想法，他希望借这两次会议把毛泽东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两职一并取消。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博古提交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酝酿名单中已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但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审定之后，否定了博古的意见。由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不仅继续得以留在政治局，而且被异乎寻常地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结果，博古故意不通知毛泽东参加在苏区召开的中央全会，却又不得不把毛泽东选为仅有的政治局9名正式委员之一。

也许，博古想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使毛泽东成了正式委员，他因此憋了一肚子气，后悔不该事先请示共产国际。于是，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人事安排的问题上，他刻意将自己

3 李德：《中国纪事》，第24页。

4 转引自申长友：《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第152页。

的名字排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名单的第一位，将王明的名字排在第二位，将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的名字排在了后面。他便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自作主张，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免去了毛泽东的政府主席职务，只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而将政府主席的头衔给了张闻天。

于是，毛泽东刚刚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只有几天，就失去了政府主席的职务，几乎与此同时，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却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现在已经在几百个县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

不久，共产国际得知中共中央擅作主张，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担任了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明通知中共中央：莫斯科“很不满意”。

毛泽东失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的职务几个月后，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才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只是收到了大会开幕典礼的有关资料和毛泽东以上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作的报告和结论这两个小册子。此时，莫斯科对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是什么态度一清二楚，但他们接到毛泽东这两个讲话稿以后，无一例外地给予了高度评价。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其翻译成多种语言，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

8月3日，在给中共中央的密信中，王明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同样的措辞的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丰富的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纠正），其他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进行译印。中文本印刷得极漂亮。”

9月16日，王明再一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告知莫斯科不仅印制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而且还为毛泽东同志出版了著作单行本。信中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些报告同时出版的，

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⁵

莫斯科不出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的文集，不出取代了毛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的张闻天的文集，当然也不出王明的文集，却别出心裁地出毛泽东的文集，莫斯科的意图不是非常明显吗？

事实上，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成为中共生存发展和战胜国民党的首要条件之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越来越重视毛泽东的作用和影响，临时中央压制毛泽东的种种做法，并没有得到莫斯科的赞同。

有人说：“莫斯科几乎从未宣传过博古和张闻天，而它这时正全力宣传毛泽东的情况看，如果这个时候莫斯科有机会指导中共中央并选择其总负责人，它是否会像遵义会议那样把张闻天推出来总负责，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⁶

这话有相当的道理。

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

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工人阶级太远。

——周恩来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怎样看待毛泽东，并不只是一个简单地对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说穿了，是怎样看待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是原则上认同，还是原则上反对的问题。

那么，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立场，究竟是原则上认同，还是原则上反对呢？

对此，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主导思

5 转引自青石：《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第32页。

6 见青石《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

想上始终坚持城市中心论。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是抵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结果。这种观点在国内史学界流行。

另一种观点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没有坚持城市中心论，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革命道路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设计的。这种观点以苏联史学界和美国学者桑顿和肖祚良为代表。

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不尽符合实际。

实事求是地看，毛泽东率领红军进军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并且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因此，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开辟不是莫斯科设计的；另一方面，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并没有始终坚持城市中心论，它对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经历了一个从轻视、怀疑、观望到支持、鼓励的过程。

从整体上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比当时的中共中央更早地认识到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正确。因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经历了一个主张城市武装起义到主张城乡斗争并重，最后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的过程。这一过程同城市中心论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日益缩小，最终为多数同志所抛弃的过程是一致的。中共从接受到抛弃城市中心论的整个过程都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态度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6月中共六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坚持城市中心论，但在具体实践中改变了欧洲革命首先占领首都，然后把革命推向全国的模式，主张在敌人力量薄弱、革命潮流高涨以及党的力量最强的地区首先发动起义。

六大以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用城市观点指导中国革命，主要表现在：

主张以城市为武装起义的起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几次起义都试图通过在城市举行武装暴动来推进革命。对于南昌起义这一在城市举行的暴动，布哈林认为这“对我们的策略将是最好的论证”。对于南昌起义的部队不是深入农村，而是向广州进军，他也持赞成态度。⁷

7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第16页。